

文化研究在臺灣體制化的20週年 ——我的再學習與再反思*

Twenty Year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 My Re-Learning and Retrospection

姜亞築**

Ya-Chu CHIANG

一

在我可能有限的接觸和理解中，我觀察到文化研究的一些老師們長期致力於將文化研究這個外來且和臺灣社會有些隔閡的學科，變成一個真正具有能夠思考臺灣歷史社會真問題和真意涵的有效學科。除了介紹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脈絡之外，還試圖透過文化研究的範式，進入到臺灣歷史的脈絡當中，並在這一歷史脈絡中摸索能夠有效思考臺灣歷史社會獨特性問題的方法。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學院所建立的一套學科分類以及學術運作方式，被放到和臺灣社會相關的討論中重新相對化，並試圖糾正此前臺灣學界容易將美國所建立的學術思路和學術方式作為絕對標準的問題——即透過文化研究所打開的「亞際」思想平台，藉由閱讀一些亞洲經典性文本（如溝口雄三 [1932–2010]、竹內好 [1910–1977]、白樂晴、魯迅 [1881–1936]、陳映真 [1937–2016] 等亞洲思想家的文本）

投稿日期：2019年9月2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0月25日。

* 本文的寫作基礎來自本人於2018年3月11日文化研究年會《文化在民間》的〈文化研究二十年：新世代的展望〉場次的報告，但在和多位師友交流和思考過後，本文的結構和內容和原先圓桌的發言稿差異甚大，無法表現圓桌現場的狀態，因圓桌發言尚有些闕漏，故請以本文為準。除了同組圓桌發言人的啓發外，還有許多師友也對我啓發甚大，在此難一一列舉感謝，請見諒。

**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博士生。

電子信箱：jasmarkia@msn.com

來照亮對臺灣所處位置產生的參照性區域意涵。除了討論內在於東亞的美國因素外，同時也思考在與西方不同的亞洲現代性中，臺灣和亞洲其他國家或區域所共有的後發現代性問題和思想¹。

文化研究的課程和活動，帶給我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也是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在2010年到上海求學，後來又到了北京。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我希望透過對大陸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回過頭來整理在臺灣視野中較難認識到，卻又和臺灣社會高度相關的一些問題，例如如何理解中國革命，臺灣和中國革命的關係，以及如何「歷史化」兩岸關係的發展。

大學時代到亞太／文化研究室工作期間，老師們不斷提到將問題和思考「歷史化」的重要性，但是，為什麼要歷史化？需要將問題和思考進行何種歷史化？什麼樣的歷史化才是有效的？如何歷史化？如何才能擺脫當下政治氣氛、知識體制、知識流行所規定的認識機制和直覺性的簡單認知，真正進入到臺灣戰後史中，把握到影響歷史的關鍵結構性因素？這些問題我都還在體會琢磨，也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想要努力闡發的課題。

二

解嚴後的我們這一代，在選舉行之多年以來，被選舉機器高度形塑和制約，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容易被選舉的政治語言穿透、打造和形塑，每一次的總統大選都牽動著人們的感官神經。也因為選舉語言的策略性和高度調動性，人們難以跳脫候選人給定的思維框架，去思考這一給定框架之外的社會問題，如何穿透這一選舉語言所形塑起來的社會感覺，去認知到這些思維框架以外的問題，其實成了知識工作者需要面對的挑戰。

我們常常感覺自己是帶有責任感並真誠且認真思考的，也總是想找

1 在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工作期間，也正逢亞太文化研究室邀請來自韓國的白樂晴教授來臺討論韓半島上的「分斷體制」問題，以及由韓半島問題觸發的關於兩岸的思考，並且同時也是亞太文化研究室推出重新思考關於陳映真思想、文學、歷史的契機，此外還有大陸學者來臺的訪學交流。

出自己認為對的，而且是對社會好的道路，卻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回頭看，發現自己似乎被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的選舉手法給算計了，因為現實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樣，因選舉結果產生了好的變化，甚至有被騙之感。並且基於此，當選舉結束後爆發出深層的社會問題時，人們又容易傾向於倒向和這次勝選者對立的一方，形成這幾次總統選舉結果出現的鐘擺式擺盪。因此，無論藍綠統獨，在現今這樣一種特殊的民主運作方式當中，社會少有空間談論真正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或以更長時段的積累來思考這些問題，繼而予以有效的回應，更不用說對社會提出更長遠的建設性規劃了。人們已被現在的選舉文化塑造成一種特殊的狀態：過快地根據某一議題和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來思考和認知自身所面臨的問題，一個議題一出現，人們就快速站隊，並根據這一陣營給出的說法來形成自己對社會的認知。

選舉文化所形塑下的我們，容易從家庭當中、或某個對社會局部的觀察當中，習得一些看待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將其作為自己面對社會的支撐點，在和別人討論的過程中過於簡單地將他人定位在一個政治立場上，以己之是評他人之非。在這過程中，自己沒有隨著不能理解的社會難題而成長，僅僅將問題歸結於對立一方的問題，這形塑出了一個粗暴且簡化的集體思想氣氛。不少人都能感覺到這種粗暴且簡化的思想氣氛帶來的對立感和窒息感，卻始終找不到一種有效破除這種思想氣氛的方式。

在這樣一種思想氣氛下，個體並沒有形成益加飽滿的意義感和自信，反而在諸多繁雜矛盾、無法理解的邏輯中愈加粗暴簡化，更糟的可能還導致個人的困頓和虛無，以自身較為簡單的邏輯覆蓋所有的問題，又陷入更深的自我懷疑當中。一些原來對知識和思想感興趣的朋友，為了避免這種對立感和政治敏感的氣氛，選擇了看上去「小確幸」的生活方式，在物質或某種知識以外的興趣方面安放自己。然而，在「思想」不能有效回應社會對個人提出來的問題和挑戰，以及不能回應自己身心的困頓，且思考這些「思想」又帶來某種人際之間的緊張感的狀況下，以「小確幸」回應，並不是真正地從這些困境中突圍的方式，而是選擇了以「不思想」應對之。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另一種狀態：為了擺脫道德感不足和麻木不仁的

虛無狀態，或想對現實中不公不義的現象有所行動，有些朋友會奮力投身到社會運動中。社會運動對臺灣方方面面的貢獻有目共睹，但由於沒有擺脫現有對問題的認知方式來進行運動，運動依舊不能不受選舉政治的束縛，並且容易過快以一個議題在一次選舉當中的有效性及時效性來考慮運動的走向與操作，如此一來，使得運動者自身因配合選舉和選票，難以對社會提出更高的構想、難以對社會問題有更深更長遠的探索和規劃；另一方面，配合選舉的運動，容易和政黨力量結合，但又難維持在政黨中的獨立性，在選舉過後被政黨收編、甚至瓦解，運動成果被政黨收割，運動領袖成為政治新星或悖德政客，從而削弱了社會運動對臺灣社會形成永續性和建設性的積極力量。而這樣一種狀態往復，也導致有更多社會關懷的人產生更深的困頓和虛無感。

在此當然不是要代表我們這代人說話，僅僅是試圖描繪出自己這個七年級生對這個時代的觀察和感覺。我個人特別深的感受是：過去幾十年中，臺灣社會因為發展付出了代價——像是環保問題、農業問題、食安問題、母語保存（文化失落）和弱勢族群正義等問題——可以看到七年級生的我們這代，有很多優秀且極富社會責任感的人，以非常強的道德自覺感，主動放棄自身的利益和個人階級的向上發展，熱烈投身在上述議題的運動當中，以堅強的意志和精力在抗爭。其中有些人是我特別敬佩的朋友，我也分享著他們的運動經驗，但同時又看到這些朋友在這些議題運動過後的無力感，社會似乎沒有如預期變得更好、更有力量，反而，社會的某種力量在運動後喪失，愈來愈多參與運動的人出現無力感和虛無感，而運動果實也被政黨政治收割和收編。為什麼出現這樣的無力感和社會結果？我自己也常常陷入更深的自我懷疑當中。抗爭勝利似乎只是某種道德感覺的一次性勝利，但勝利的結果似乎卻又造成了社會發展更加裹足不前，致使不少人認為這些運動是以反經濟發展為代價的，於是出現了不少民衆和運動菁英之間的撕裂和對立性認識。

我們原來所具有的對現實和社會問題的認知是正確的嗎？我們這樣的抗爭方式和內容對社會更好嗎？我們的能力真的足夠承擔臺灣社會中的難題並開展出一個更好的社會圖景嗎？我發現臺灣社會並不需要我個人廉價的道德

正義感，而需要有能力解決和克服社會問題、開展出美好社會生活遠景的人。

從一些社會運動中，似乎也看到一些讓人憂慮的面向，特別是二元結構的對立思維。投身某一議題容易將這一對立從社會和歷史結構中抽離出來，例如一個投身環保問題的人，容易以環保問題為絕對，而忽略了環保問題在整個臺灣社會和歷史結構中的位置——如何平衡環保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議題間的關係，以及如何認識產生這些問題的歷史脈絡。這些年的運動塑造出一個認識氣氛是：將環保和發展對立起來，不少人產生出只要選擇發展就不能環保的認識，以及為了環保就要反發展的傾向，這反而使得一個社會對於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失去內在的建設性思考視角——對工業，我們能否予以有更為環保的規劃和監督，兼顧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

今天回看當時，才意識到時代和歷史的巨大變化給我們解嚴後這一代人非常大的挑戰，我們這代人出生的時候是冷戰的高峰，和中國大陸的交流是非正常化的隔斷狀態，大學時期這種強烈且絕對的隔斷在慢慢鬆動，周遭出現了我們所不熟知的大陸人，而這樣的鬆動對我們這代不少人來說，是陌生且讓人憂慮的。但我們自身的狀態和能力，似乎不足以讓我們有效面對這些陌生和未知。中國大陸的大和複雜遠遠超過我們消化和理解的能力。但在面對這樣的大和複雜時，我們是否能建立起一套互動較為有效且更加有耐心的認知方式，足以將這樣的大和複雜納入到我們的思考當中，豐富我們對自身、對世界的認知——而非將原來沒有積累的淺薄理解過快地套用在對方身上——同時直面中國大陸乃至世界的大和複雜，培養起自身社會對此「大和複雜」的、具有建設性的認知、理解和應對能力？這一任務是解嚴前的一代人難於思考的課題，而七年級生身為解嚴後第一代人理應挑起這樣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

三

我高中到大學的求學時代，剛好就是陳水扁執政的八年，這時期是我進入臺灣問題的原初點，扁時代的政治語言對我有很多層面的制約和規定

性。例如「什麼是愛臺灣」這個問題一直籠罩著我，我常常自問：到底怎麼樣才是真的愛臺灣？陳水扁就任總統期間，以極強的認同政治的語言方式打造某一種臺灣認同。這一認同話語捕捉到了臺灣社會中的一些現實問題和焦慮，予以整合，並賦予新的歷史定位和闡釋——生活層面如母語方言失落的問題，歷史層面則以看來價值感正確，但其實極簡化的方式，整理國民黨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問題。

透過觀察身邊的朋友和其他一些人的狀態，我開始產生愈來愈多的困惑：為什麼高喊「愛臺灣」的人有些其實更愛日本？為什麼現在這麼強調臺灣認同的政權卻復興一堆日本老宿舍和建築？為什麼「愛臺灣」的認同政治在發展或發酵的過程中，背後的內核卻漸漸地空心化？為什麼「愛臺灣」這樣一個理應是凝結臺灣社會向心力的號召，卻不斷引發一次又一次的社會分裂，且在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後，社會更加不斷地向後退卻且封閉自己？為什麼這種政治正確的「愛臺灣」方式讓愈來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為什麼「愛臺灣」發展了20年，反而不若20年前臺灣人普遍對臺灣社會有較高的自信，以及由這自信帶給日常生活、日常身心更豐厚飽滿的安定感？讓人憂心的是現在的政治以認同問題統攝、覆蓋或掏空社會問題，使得與民衆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真正的社會問題往往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認識、討論和解決，僅僅想要對外正名，卻沒能實際肩負起臺灣社會當中出現的問題和建設臺灣社會的責任，原來豐厚飽滿的生活實感和意義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被掏空。

如果不是僅僅將問題歸咎於與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對方，在看到社會其實出了很多問題的同時，現在是不是可以思考：我們「愛臺灣」的方式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例如，原來在推行國語的歷史過程當中所沒能處理好的部分，該怎麼在今日加以討論和進一步克服，而非被政黨轉化為族群鬥爭，使其變成選舉資本？並且，原初推行「說國語」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凝結多語言、多方言的多族群社會狀態，儘管在推行過程中有偏差和錯誤，但以母語或閩南話為官方語言，是否能夠超過國語，真正起到凝聚全臺灣社會的作用？又例如，政黨過度依賴於某些容易調動的歷史社會記憶、情感召喚等激烈手段來處理認同問題，這一手段既排斥理性討論的

介入，其激烈又導致後來的社會感覺被強烈形塑和制約，更何況通過極強地調動、召喚和煽動情感記憶來達到的這種「臺灣認同」，對於不是這樣經驗、記憶、情感的其他社會族群成員，又造成了強烈的壓迫感。

從我開始對政治有個模糊認知的扁時代以來，社會氣氛造成我的另一個困惑是：為什麼與極強的、煽動性的「愛臺灣」的認同政治式並行的，是社會中「臺味」、「臺客」、「很臺」在使用中所暗示的負面性意味？如果對於臺灣人主體具有很強的認同感，為什麼這個「主體」所展現的都是否定性的自我想像，而更高的文化主體只能是美國或日本？

在扁時期高漲的臺客文化，將某個時期的「本土化」固化為一個道德想像。這樣的臺客文化具有雙重性，在所謂的「國民黨外省統治」面前是一個膨脹且激烈的反抗性主體，但談及日本時卻又抑制不住其源源冒出的自卑感和自我矮化，視之為「土的」、「落後的」。這樣一種看似飽滿其實空洞的文化主體，沒能得到充分的檢視，日後的開展自然更加積重難返。在面對像日本這樣一個優於自身的文化他者時，我們為什麼是以這樣盲目地抽空自己的方式學習他者，而不是在同時，使自己的生命感覺更為自在、發舒、暢達？

經歷特定政治時期和狀態形成的「臺灣意識」和「本土化」內涵，並沒有隨著日後社會發展得到更多的擴充和發展，反而因認同政治的邏輯推導而進一步固化，且封閉成一個無法自我更新或重新加以討論的特殊場域。而更年輕的人，當無法理解1945年後的歷史政治內容，又抽象地認識「本土化」和「臺灣意識」，且受制於某種政治正確時，結果往往變成接受對殖民主義的合理化——即政黨推動的認同政治為日本殖民主義開後門，將其合理化且歸納在「多元主義」底下，並進而說西班牙和荷蘭的殖民造就了臺灣的「多元」，臺灣以有那麼多的殖民歷史所造就的「多元」為榮。其後果是破壞了自身主體的樹立，失去一個真正認識臺灣歷史內核的機會和可能。

「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在今天臺灣，沒有真正成為有效整合各個族群歷史和經驗的觸媒。這裡並非要否定多元文化或多元價值，而是致

airiti

力於思考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多元」，真的是「多元」嗎？如果不是，我們還需要對社會具備哪些思考，使得「多元」能更有效地落實，並且讓在臺灣社會裡的每個成員能更好地安放自身的位置以及能真正受益於「多元」所帶來的包容和滋養？唯有對這些問題做更充分的思考，才能避免現有的某些制約社會的觀念，假「多元」之名，實際造成族群之間的緊張感和排他性，並且使得人們因而飽受人和人之間無以名狀的緊張和對立感。然而，要真實地建立一個豐厚且能包含人們真實生命經驗的多元，需要對歷史問題有個很好的整理，在這整理過程中，找出形成今天歷史問題的機制，並予以有效破除。

究竟殖民時期實際上對臺灣社會的衝擊是什麼，又帶來了什麼變化？我們該怎麼討論這些衝擊和變化？這些衝擊和變化怎麼形構了我們祖父母到我們父母一代的真實生活經驗？缺乏對這些環節的具體和真切的歷史認知，也使得我們這代人失去了真正認識父母乃至祖父母一代的臺灣歷史經驗的機會。

什麼構成了祖父母和父母一代人的文化內核？這些文化內核和殖民者日本或西方文化之間到底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張力關係以及博弈過程？比起現在花費政府龐大資金大量復興的日式老建築（象徵著某種更高的美學位階），許多從傳統延續下來的寺廟、宗祠等空間其實承載更多原來臺灣社群形成的歷史積澱和美學活力，前人如何隱密蜿蜒地保存著這些空間不被殖民者破壞，並使其在今日仍有效地成為安置人身的場所？這些建築究竟還發揮著怎樣的社會功能？在這裡我無意推崇傳統宗教，但我們如果簡單將其視為迷信而不屑一顧，則可能會失去從臺灣社會肌理內部理解社會、反思學院、認知自己的可能。傳統宗教是文化在長時期的歷史過程中，將某些有效的經驗加以提煉、固化後的形式表現，我們不一定要過分看重形式，但也不能不加甄別地將其中的有效經驗隨意拋棄。

將傳統宗教的有效經驗加以轉化以適應現代，也不意味全面回歸於傳統宗教或肯定宗教當中的蒙昧。如果僅僅純粹地反現代化，我們既回不到父母、祖父母的傳統裡，也更難於想像和設計一個能通往的美好未來。我

們需要去繼承寺廟、宗祠以及其他傳統習俗至今仍然有效支撐我們現代日常生活的部分，也要對其不適應的部分加以創造，並有效轉化，這一舉措是爲了更好地保留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否則我們不僅失去了與上一代溝通的橋樑，也失去了一個去繼承臺灣社會歷史經驗的珍貴契機。

四

另一個引起我深思的例子是，2007年我在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工作，那年研究室籌備了一個東亞批判刊物的論壇，邀請韓國的白樂晴教授來臺做系列演講。由於約略閱讀了些韓國社會、歷史和思想方面文章，也開始讓我產生了想認識韓國社會的興趣。另一方面，我也開始想更多地瞭解韓流文化，因此常常跟身邊的朋友聊韓國的社會、歷史和偶像明星。關於韓流，朋友們的反應大多是：日本流行文化更優越，對韓國文化乃至韓流不感興趣。他們的反應讓我吃驚的地方在於：他們在比較日本和韓國時，沒有自己的位置；臺灣的流行文化比起日本、韓國有哪些不足？爲什麼日本或韓國做得更出色？我們需要做哪些調整和努力？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些基本問題被忽略不計，直接變成去爭論到底是日本的流行文化更好，還是韓國的流行文化更好，卻沒有反觀自己，或最多是一種相當直觀的反觀。

2008年，我和亘良參加了亞際文化研究學會第一次試辦的「亞際文化研究暑期班」(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ummer School)。²在首爾，我在因美牛問題引發的燭光示威現場，看到很多韓國家長帶著小孩（或抱著小孩、或讓小孩坐在父親的肩膀上）來參加燭光示威，韓國同學替我們問這些家長爲什麼要帶小孩參加示威，有的說：要讓孩子看到，我們在爲他們的未來而抗爭；還有的說：這是美帝國主義對韓國的壓迫，我們必須起來抗爭。我當時吃驚於普通民衆脫口而出的「美帝國主義」這樣的詞語。我們去參觀燭光示威的時間，剛好碰上天主教祈禱的時間，天空下著毛毛細雨，參加示威的韓國民衆不斷地禱告，陰暗的天空和人們安靜的祈禱聲，讓場面甚是

2 請參考本期思想論壇另一位作者鄭亘良的文章，該文章有較仔細的描繪。

莊嚴肅穆。在那樣的現場，我當時心裡浮現出一個也許直觀淺薄但強烈的困惑：為什麼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韓國卻沒有出現像臺灣那樣高度個人主義且原子化的現象？是什麼凝聚韓國人對自己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和行動力？雖然燭光示威是由幾個女高中生發起的示威，但卻引發了韓國各個階層和類型的民衆熱烈地參與，韓國社會民衆之間的連帶感引發了我的好奇。

和韓國朋友交往給我印象非常深的部分是，他們高度關注社會的脈動並緊貼著現實變化，並因此對現實有著高度靈活的反應，對社會也有不同層次的分析。在和延世大學的朋友交流的過程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韓國社會的強烈批判，一位同學說韓國表面上非常反日、反美，但包括政客和財閥在內的很多上層階級，還是非常崇拜和慾望美國和日本的，他們認為這造成北韓對南韓的反感，同時也是韓半島統一的阻礙。另一位喜歡洪金寶的韓國同學，對北韓社會有非常深的認識，她認為南北韓將在幾年內很快統一，我非常吃驚於她的樂觀，但又暗自感慨，相比臺灣對中國大陸政權直觀式的僵化隔閡，韓國對共產主義政權比臺灣多了更多的研究分析，且有不同於美國、日本的認識和積累，因而韓國自身的政治擁有更多獨立自主操作的空間。十年後的今天，在目睹了文在寅政權催生的川普(Donald Trump)和金正恩的會面後，再次回想到當時感受到的韓國社會所具有的將意識形態相對化的能力，讓人感慨之餘，不禁思考臺灣社會還需要哪些思想準備才能具備這樣的能力。

2008年首爾延世大學的夏令營，讓我感到韓國人正在「艱難且痛苦地形成自己」。相較於日本在東亞區域的文明、禮貌和從容，韓國是在沒有日本帝國時期那麼深的歷史和殖民地積累下發展自己。其在東亞區域的形象，可能因為他們旺盛的競爭心、企圖心和強烈的自尊心而略顯負面。但在首爾和一些師長朋友的多方交流以及對韓國社會運動的觀察中，我卻看到他們在抵抗美國和日本的過程中，非常痛苦地形成「自己」，在臺灣朋友批評韓國不如日本文明、有教養和禮貌時，我心裡萬分遺憾的是，臺灣認識韓國的方式如此沒有「自己」，也沒有看到韓國爲了形成「自己」所經歷的痛苦。

我並非意在無條件地稱讚韓國，或揚韓抑日，主觀來說，任何人都可

以討厭韓國或喜歡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人開始標榜自己愛泰國），但在這些喜歡和討厭中，我們自己到底是處在什麼樣的社會位置呢？我想指出的是，韓國在形成「自己」時所要承擔的痛苦和付出的代價，不被臺灣社會認知和參照。我們可以批評韓國的問題，但也要思考自身在整個區域政治經濟結構當中的位置，從而看出我們自己的問題，並有意識地根據我們自身的社會來「痛苦地形成自己」。

雖然由於近十多年的發展成就，韓國越來越進入臺灣的思考視野，成為美、日之外另一個重要參照。但是現在的比較方式本身帶來不少具有破壞性的問題。比如，這一比較方式常常導致臺灣社會政治的高度認同導向，並過度以認同作為驅動一切社會開展自身的手段。不少人仍然認為韓國展現出社會和經濟強盛的原因，是韓國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和強烈的民族性³——臺灣所以贏不過韓國是因為臺灣人不團結，不愛臺灣，只會唱衰臺灣，只想去美國和中國大陸當強國的一員——並基於這樣的認識給定一個本質化且封閉其他可能性的評斷：臺灣人就是這樣！

但，臺灣人真的就是這樣嗎？

許多人在批評臺灣人不團結、不愛臺灣，將問題全部單一地導向為認同問題的同時，忽略了社會整體結構中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忽略了形成認同的歷史和社會基礎和要素，只是以一個政治正確的方式指責和強迫人們愛臺灣，我們就能團結、就能「愛臺灣」了嗎？事實上，認同的爭取，不是應該和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教育、衛生等方面相關，目的在於創造一個更

3 這一觀念邏輯聽起來有些耳熟且成為某種牢不可破的真理。不少臺灣人習慣在進行和日本的社會成就比較的時候，將日本的成就歸結於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人團結、有民族自尊心，臺灣知識界在很多時候也是在接受這一有問題的本質主義式的認知下，進行臺日比較分析，並且如此本質化的認識也滲透和瀰漫到一般臺灣民眾的日常想像當中。但歷史地看，就會發現日本和臺灣是不同的起點，日本曾經是帝國，並擁有一些海外殖民地，臺灣正是殖民地當中的一個，在日本透過對這些海外殖民地的掠奪來達到日本國內的高積累並發展現代化的同時，臺灣正是在這一結構當中流失自己的天然資源，且成為日本發展國內跨國大資本的海外市場（今天仍是）。臺灣在對日比較當中，無視這樣非常常識性且基本的政治經濟歷史狀況，本質化地強調日本的民族性，而這一本質化的認識又形成了臺灣今天認同政治的某種觀念感覺和認識基礎。

airiti

好的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嗎？僅將「認同」從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教育、衛生這些社會結構性要素中抽取出來突出、強調，反而使得「認同」變成對以上結構性要素形成破壞性力量，因而弔詭地，愈強迫人們認同，反而愈是失去對這一社會認同的吸引力。在認同失去吸引力後，「認同政治」又更具破壞力地大行其道。比如，儘管推行母語，但由於地方發展失去競爭力，人們被迫離鄉背井，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地方發展對人們在其中生活的容納能力變低，母語問題反而不若過去經濟發展時期那樣來得有吸引力。

更弔詭的是，說「臺灣人就是不團結」的人，一方面帶著某些本質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往往也支持上述為殖民主義開後門的做法，從而在邏輯和現實結果上形成一個內在的自我消解——即，如果將各式殖民文化不加檢視地一律作為自身「多元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樣的「多元」意味著殖民主義對「自身」的破壞和殖民是可以接受的，那麼「自身」也就不需要樹立一個社會凝聚力。

本應藉由反對殖民主義來強化的社會凝聚，結果卻因這樣的一種「多元」方式來加以破壞殆盡。這也使得後來更年輕的人們在認知自身歷史時，失去了歷史的眼光——對臺灣被殖民和反抗殖民的歷史過程有更複雜的理解——繼而困惑於：我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七、八年級生的我們，陷入了深深的時代失落當中，加強了人們想離開的心情。

除了這一自我消解的結構性破壞之外，還需要考慮到的一個面向是，韓國、日本的國家認同有較長的歷史基礎和較獨立的文化氣氛，並且行之已久，而臺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以日本和韓國的方式去強化對國家的認同是否有效？單一旦抽象地強調臺灣意識是否就能保證臺灣社會的凝聚力？以及是否就能解決臺灣社會產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到底是什麼、以及我們該怎麼認識這些問題？為什麼我們感覺自己好像對臺灣社會非常關心，但我們的討論卻仍然是那麼抽象、空洞且高度主觀？美國和臺灣同是移民社會，美國凝聚社會的能力和方式來自西方歷史的獨特性，我們簡單挪用美國經驗又是否有效？那麼我們該如何認識臺灣社會和歷史的獨特性？到底哪些歷史社會元素是在安排臺灣這樣的移民社會時特別重要的元

素？知識界或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怎麼透過知識工作掌握到這些元素，並且將這些元素放到臺灣社會的公共意識當中，使這些元素進入到人們考慮臺灣認同問題時的日常理性思維的軌道上？

可以觀察到，「臺灣人認同」和「本土意識」從某個角度看，在道德上也許是正確的，但在現實上的展開卻出現了那麼大的問題，且愈發展愈使得社會氣氛和個人主體認知狹隘化，並給臺灣社會帶來相當大的破壞。總說臺灣是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但今日認同政治導致的社會內部排他性進而造成某種很強的封閉性，其實讓不少人非常難受。我身邊一些選擇離開臺灣社會到外地發展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對今天社會所展現出的內部排他性和政黨政治的強烈反感，與一般人對他們的評價有些錯位——很多人認為這些離開臺灣到外地發展的人是因為經濟因素，但從我身邊朋友的真誠談話當中，除了經濟因素外，反映出更多的是對政治和臺灣社會氛圍的失望，甚至有些朋友是飽受現今認同政治中的排他性帶來的心理折磨，在難以排解的困頓中才離開臺灣。

我們到底該如何認知這樣的困境？

在這些問題面前，重新思考老師們說的歷史化的時候，便可以感受到我自己過去面對臺灣歷史的過於輕率和自以為是。例如，我無知於整個當代臺灣歷史形構為何，而僅僅依賴一些抽象的大詞和事件，或者如文化研究提出的基本議題來瞭解歷史，如從冷戰、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白色恐怖、國家主義、全球化、商品化和消費社會這些詞出發，瞭解其對應的歷史等等，過分簡單地將眼前所認知到的問題歸結為這些大詞或議題的對應物，並且只能調動自身過分簡單的道德感去反對這些大詞對臺灣社會的壓迫。

問題是，這些大詞在西方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過程和社會脈絡，我們是否能僅僅透過這些大詞來認知我們自身的歷史？

並且，在反對過後呢？

在這些問題面前，歷史當中的人們如何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並提出什麼樣的解決或應對方案？我們的思考和努力是否大於這些先行者？

現在常見的一個情況是，我們並沒能很好地繼承前人的思考和努力，我們的思考在小於前人的同時，還以簡單的邏輯覆蓋掉前人的努力，這樣一來，前人的努力成果更不容易為我們所繼承，另一方面，過度以自己的邏輯為唯一正確，容易妨礙我們進入他人對問題的感知並予以有效的把握和真正理解問題，甚至容易以自己的認知為絕對而鎮壓他人的認知。我們以為自己處理了問題，而其實我們連關鍵問題的全貌都沒能真正地辨別出來，不過隨著這些抽象的詞翩翩起舞而已。

這些抽象的詞彙和事件坐落到歷史和社會中的生活時，當時的人們是具體地感知這些問題的，無視於這些具體的我們，容易跳脫出歷史脈絡直接對抽象反應，也就因而無知於這些詞或大事件是如何塑造具體生活在這樣歷史和社會中的人們，及他們對社會的感知和思維邏輯。進而，也無法瞭解在這些社會表像下，推動歷史運動方向的更深層的關鍵性要素。無法有效理解上一代在回應怎樣的社會問題，無法真正吸收他們積累下來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更不用說運用這些經驗來認識、克服自身遇到的問題。

我開始焦慮：如何擺脫現有的高度受選舉政治制約的學術氣氛，建立一種不是以自己主觀對歷史的認知和解釋，或以立場來清理、推導歷史的學術研究，而是進到歷史當中仔細且耐心地辨析後所生產出來的研究？如何能接住先行者的問題意識，將自身相對化後放進一個更大的歷史和社會的結構中考慮其問題？如何進行一種有效的知識工作來整理並超克導致今天出現那麼多問題的觀念機制？到底該如何更加有效地認知臺灣社會的深層問題？如何可以進到父母乃至祖父母那幾代人的歷史經歷中，看他們生活開展的方式，從中理解他們對社會和社會問題的認知，而不是以自己的觀念去鎮壓他們的感受，或批評他們被洗腦，或掉進他們對過去美好的、懷舊式的復古主義中，而無法開展對未來的社會在面臨新的難題和挑戰下的想像與規劃？如何擺脫當前極強的非歷史的政治趨力，回到對歷史的深度認知當中，回到先人存在的生活情境中體會他們所感知的歷史難題？也正是在長時段的摸索和挫折之後，我才體會了歷史化對各學科研究乃至對思考今天臺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

五

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們，已進行了大量知識工作，試圖將文化研究變成能面對臺灣社會和歷史，並與之互動的學術領域。這對於臺灣知識界而言是彌足珍貴的探索。我和一些朋友都受到文化研究在知識上的啓發，這給了我們一種在知識探索上的社會意義感，甚至是生命意義感。而文化研究另一個特別珍貴的特點在於：試圖回應眼前的迫切問題以及調動人們投身知識探索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問題可能也出於此——我們帶著自身的社會和生命意義感投入到社會議題中，但對整個歷史社會的較為整體且結構性的把握的缺乏，導致我們高度被單一議題的正反兩方制約，且容易倒向看上去道德正確或理論正確的一方，後果通常使我們容易在一個給定的問題框架中思考一個簡化的問題甚至是偽問題。

文化研究如何克服上述的難題，在現有的基礎和積累上往前推進？我們如何更認真且負責任地對待文化研究的知識生產？現階段的反思性分析是否真的充分和足夠？如何整理臺灣戰後歷史經驗的自我理解，如何在這自我理解中突破和再出發？文化研究的知識積累是否真的給予我們一個思考我們生存的時代和社會以及歷史的有效空間？學生更加捨棄學院生產的知識而直接投身運動現場和依靠運動本身來獲得知識，形成自身對社會的認知，這對文化研究這樣一門自詡為高度社會介入且強調在地性的學科又意味著什麼？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深化臺灣文化研究所必需面對的問題，我期待臺灣文化研究在自我深化的意義上再出發！